

編者按

回顧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百年史，中國有兩次現代化高潮。近的一次是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。我們躬逢其時，一方面深切體會近二十年來中國人的物質及精神生活的迅速改善，另一方面也為變革所帶來並逐步加深的各種社會問題感到困惑、憂慮。遠的一次則是二十世紀開始十年的清廷新政。本期袁偉時和方平兩篇文章，正可以顯現那一時期社會的巨變及其引發的問題。袁偉時充分肯定清末新政在促進經濟高速發展，建立現代教育和法律體系、司法制度，以及開創民主政治等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有實效的改革。方平則以上海民間報刊為例，簡要評述這一時期現代公共輿論的勃興，及其對建構新型公共領域的重大影響。二十世紀一頭一尾的這兩次現代化有那麼多相似之處，無怪袁偉時要說：「中國大陸當前的改革開放，是清末新政的繼續。」

四年前，傅高義 (Ezra F. Vogel) 在本刊 (1996年4月號) 發表文章樂觀地預測：二十世紀末中國的高速成長在二十一世紀可能再持續數十年，西方將目睹前所未見的財富和勢力大轉移。我們當然希望中國強大，正因如此，更不能不思考推動了中國社會前進的清末新政，又引發哪些不可克服的危機，以致十年後的辛亥革命顛覆了清王朝。袁偉時在總結「中國勝利，清廷失敗」的經驗教訓時指出，政治制度改革當斷不斷、無力制止貪污，從而失去了穩定社會秩序的制度保障，是造成清廷新政功虧一簣的基本原因。雖然歷史不必重演，但值此新世紀之初，中國百年來現代化歷程的前車之鑒，不正是應該重視的嗎？